

大马“南洋”叙述中的台湾影响及其再现模式

朱崇科

(中山大学 亚太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台湾经验和马华文学生态关系的讨论属于华文文学学科前沿性课题。对于马华文学中的留台作家群体来说,台湾经验以及相关思潮对他们个体创作的影响及其再现可以分成四种模式:1. 宏观的留台马华作家谱系及其诗社,以王润华的诗歌为代表,既体现了当时台湾型现代主义的各种优点和先锋性,更好地观照台湾,又具有国际主义视野和情怀,创设出独特的南洋诗学;2. 立足台湾的南洋书写,主要是考察马华作家在台湾时的有关南洋的文学创作,核心问题指向“原乡”;3. 扎根大马的南洋创制,主要是研究留台后回归南洋的作家们的创作;4. 台湾视野下的南洋论述,呈现出马华批评的台湾视野及其丰厚力度。上述四种模式更多是从宏观层面的梳理,更具体的个案叙述有待继续深化和完善。

关键词:马华文学;南洋叙述;台湾影响;王润华;张贵兴;潘雨桐;黄锦树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5)03-0087-09

引言

有关区域华文文学和其影响文化-资源关系的讨论,其实是一个相当有趣的课题。如果单纯从比较文学所言的影响论的角度处理,难免会简单化了某区域文学发展、形成的复杂性;但如果过分强调其本土特质,似乎又夸大了区域华文文学本身演进的事实。因此其中的细微之处需要有心人士结合具体区域文学的互动关系实际而展开认真的思考。比如,以20世纪中国文学和大陆以外的区域文学,比如马华文学的关系为例,我们可以说,马华文学的现代性和中国现代文学息息相关,甚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马华文学“场域”(field)^①里,绝大多数的作者都纠缠了浓郁的中国性,毕竟,他们大多数人的政治身份都依然是中国护照持有者。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马来亚(今称马来西亚,简称大马)本土的固有文化影响元素,本土(性)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而其现代性的变迁其实何尝不添加了本土的色彩而显出与中国文学的较大差异。^②

眼光略作偏移,如果我们去考察台湾“场域”与“南洋”华文文学的关系,自然也不乏吊诡和幽微之处。毋庸讳言,台湾经验和马华文学生态关系的讨论属于华文文学学科前沿性课题,相关研究

收稿日期:2014-12-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研究”(14ZDB080)

作者简介:朱崇科,男,山东临沂人,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教授,文学博士。

① 这个概念当然是出自法国思想大师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2—2002),具体可参布尔迪厄著、刘晖译:《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新修订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② 有关马华文学本土性的考察参见朱崇科:《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中成体系性的关联论著目前不多,主要就是陈大为教授著述的《最年轻的麒麟——马华文学在台湾(1963—2012)》(国立台湾文学馆,2012);论文也相对较少,直接关联的如高嘉谦《马华小说与台湾文学》(载《文艺争鸣》2012年第6期)等。简单而言,马华文学生态发展与台湾经验的关系,目前的研究多数集中在陈大为、黄锦树、高嘉谦等留台学者那里。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在他的论文集里对此领域多有提携和涉猎。中国大陆方面由于资料限制和兴趣不同,可谓略有述及,如刘小新、黄万华、朱双一等都是个中好手,但往往因为论述焦点的侧重大多语焉不详。

相较而言,此方面的论述依旧薄弱。陈大为的专著是目前为止最为集中的论述,它以相对翔实的资料为我们清晰勾勒出一条颇有连贯性的留台/在台马华/台湾文学的路线。他也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在台马华文学作为马华文学板块之一三足鼎立(另两足是西马文坛、东马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容忽略。而其论述的焦点主要是:1.“马华旅台诗人群的崛起”(以星座诗社、神州诗社为中心);2.“马华文学的地景构成(1977—1987)”;3.“自传体写作与学院派风格之形成(1989—2007)”;4.“武侠与科幻:马华文学的幽暗角落”。或许是时间原因影响(如作者陈大为在后记所言,“其实这并不是一部我计划中的著作,比较像是接下的一项任务,在有限的心力和时间内完成”),又或者是不得不遵循体例要求(此书被纳入李瑞腾教授主编的台湾文学史长编,编号31),此书仓促成型出版的痕迹显而易见,也因此不乏争议。相较而言,最精彩的部分恰恰是关于诗人的论述,而陈大为本身也是卓有成绩的诗人,可谓吻合了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关于“诗人批评家”(poet-critic)的精彩论断和说明。^[1]但同时此书也有焦点飘忽、文体和作家比重分配不均、过分重视文学奖等缺陷,甚至让人清晰觉察“诗人批评家”的偏执。如在台马华批评家黄锦树就犀利甚至不无尖刻地指出,“这本《最年轻的麒麟》是贬低小说而拔高诗与散文的,巧的是,这恰恰是大为和怡雯最擅长的领域。以篇幅来看,整本书只有三个主要作者:温瑞安、陈大为、钟怡雯。”^[2]

限于篇幅,本文主要锁定马华文学中的留台作家群体,考察台湾经验以及相关思潮对他们个体创作以及“南洋”(此处主要是指大马)文学生态的影响,同时也反过来会处理它们对于台湾文学生态的更新和扩展。“台湾经验”当然是一个流动的、发展的概念,它主要是指实实在在的台湾地域、文化、教育、政治、现实生活等层面。当然,从实际操作上,我们似乎很难区分哪些是台湾影响,哪些是自我创造,甚至哪些是融合之后的再创造。毕竟,文学创作往往更是个体的事业。为此,在考察时一方面会考察台湾影响的具体面目,另一方面也采取更宽泛的内涵,主要集中在跟台湾相关或在台湾发生(过)的文学现象。但同时又不能过于宽泛,比如华裔英语作家欧大旭(Tash AW)虽然影响力广泛,而且其作品中呈现出非常独到的“大马”认同悖论^[3],但他更多只是出生于台湾,作品和台湾的关联度较小。毫无疑问,台湾作为文学生产的重要场域,也为那些虽然未曾留学台湾却由台湾提供亮相机遇的作家也不少,特别具有影响力的马华作家包括黎紫书等,类似的其他马华著名的本土作家还包括,李天葆、陈志鸿、龚万辉、吴龙川(沧海·未知生)、贺淑芳、黄玮霜等,都在台湾出版过著作。如高嘉谦所言,“台湾提供了这些马华作者初次出版著作的机会,甚至成了不少作家持续投入写作和参与文学活动的重要地域。”^[4]

南洋叙述也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有关南洋的创作,比如小说、诗歌、散文中的南洋故土书写与虚构,另一方面是关于马华文学的批评,这里的叙述也就变成了论述的意思。当然,也会兼及这些作家在台湾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南洋”并非笔者中国中心的表现,之所以称为“南洋”,是因为早期的留台生如李永平、王润华等人,他们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彼时的故乡还是英属殖民地——马来亚或婆罗洲,还不存在马来西亚的说法,尤其是“南洋浪子”^①——李永平本人内

① 这是李永平的自谓,可参王德威:《原乡想象,浪子文学——李永平论》,《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心不太认可马来西亚(1963年)的说法。这个时候用“南洋”一词反倒吊诡地更具有涵盖性。

马华文学中的台湾元素再现可以分成四种模式:第一种,留台马华作家谱系清晰可辨,呈现出一幅宏观图像。一方面,包括群星璀璨的个体作家连缀,如王润华、淡莹、陈慧桦、傅承得、林绿、李有成、张锦忠、林幸谦、林建国、李永平、潘雨桐、张贵兴、黄锦树、钟怡雯、陈大为、陈强华等;另一方面,也包括别具特色的文学社团,如星座诗社、神州诗社等。第二种,立足台湾的南洋书写,主要考察人在台湾时的有关南洋的文学创作,代表性作家如王润华(南洋植物、中国意象)、温瑞安(中国情结)、林幸谦(文化中国的投射)、李永平(南洋、台湾、文化中国等)、张贵兴(热带雨林,台北等)、黄锦树(台湾、中国与南洋的互动)、钟怡雯(南洋个体记忆散文)、陈大为(有关南洋的“史诗”)等。第三种,扎根本土的文学创制,主要研究留台后回归南洋的作家们的创作,如陈强华、潘雨桐等等。稍微扩展开去,新加坡华文作家也有上佳表现:如柯思仁(通过台北反思新加坡)、蔡深江(语言的中国化与混杂)、许福吉(书写新加坡)、陈志锐(后现代实践)。第四种,台湾视野下的南洋论述,代表人物主要有张锦忠(南洋论述)、黄锦树(马华文学批评)、林幸谦、林建国(对马华文学的理论建构)、钟怡雯(亚洲散文中间的中国图像)、陈大为(马华留台作家论述)、高嘉谦等。

模式一:星座诗社干将王润华的台湾图像

按照时间顺序最先呈现的该是第一个问题:如何萌蘖?而代表性作家之一则是王润华(1941—)。他自然有他的特异性,长期以来,他奔走于大马、台湾、新加坡、美国等地,对于放逐(exile)诗学的作用和实践颇有心得。他相当清楚自己作为一个跨国的多元化的华人身份,孜孜不倦地汲取各种现代派的合理因素,柔韧含蓄,努力建构一种新的本土中国性,其重点则是南洋诗学建构。在此过程中,他既强调正面进攻,从植物、水果、动物、人文历史加以层层叠构,同时又借重他山之石加以强化、确认。当然,他从不固步自封,而是一直强调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融合,力图实践并彰显他作为跨国华人的丰富文化属性。

王润华其实也有潜在的对话者,就是在他之前的马华文坛上举足轻重的资深作家方北方(1918—2007),后者是从中国性逐步演变成马华本土中国性的经典个案。方北方从创作成绩、努力程度、道德高度等诸多层面来看,都是马华本土现实主义小说书写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文学本土化转型自有其重要价值,比如为马华大历史代言、反省华人的问题,也放眼未来,其“马来亚三部曲”从此角度看是其认同转型的代表性作品。其书写思想内容和提出的马华问题会继续成为后来者借鉴和重写的资源,但其限制也必须为后人所警醒。^[5]第一种模式在王润华身上有着相当繁复的呈现:某种意义上说,王润华的诗歌汇聚了当时台湾型现代主义的各种优点和先锋性,但同时留学美国却又让王润华具有跨越台湾的宏阔中华性;而21世纪后定居台湾十年却又让王润华可以更好的观照台湾,从而既具有国际主义视野和情怀,同时又能创设出独特的南洋诗学。

(一)走向并建构台湾型现代主义

1962年王润华入读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并与友人创办了星座诗社,出版《星座诗刊》。王润华针对自己留学台湾时的文学状况写道,“1962至1966年我在台湾读大学的四年,正好是现代派文学猛烈颠覆台湾的反共抗俄的文学时期。年轻的一代,没有中国经验的人,完全被现代派席卷而去。我马上张开胸怀拥抱现代诗歌,因为个人的、青春的想象,最容易和大胆的、虚无的反抗制度的语言走(疑为“奏”笔误,笔者按)出和弦。”^[6]某种意义上说,王润华是台湾现代派的受益者:1956年,纪弦与同好们合组“现代派”,接着,覃子豪以象征主义等问题缠绕加入论辩;接下来是余光中、林亨泰分别扛着蓝星、现代诗派的大纛粉墨登场,他们继续台湾现代主义诗学的辩证。^[7]同时,沐浴其中的王润华又是台湾现代诗发展和充实的回馈者,其诗集《患病的太阳》《高潮》中多有体现。

相较于《患病的太阳》的整体清新,《高潮》由于添加了不少创作主体的情绪波动、事件发展,而且往往会借古喻今、古今并存,在此类幻设后诗作更多了晦涩与浓郁。如《北上》(1968)一诗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北上”情结,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信息爆炸与事变频仍,从大社会到诗人自己的小世界都呈现出一种焦灼感:“一个不惯投宿于欢呼与掌声的难民/我多次翻越过丛林深处陡斜的公路/穿进又闯出陌生小镇狭窄又拥挤的街道/打油站广告的阴影下/捧着焦虑的头额/伏在方向盘上作短暂的喘息”。据诗人附记所言,他是“站在往北的公路旁,等待一位学者兼诗人给我的消息。他的声音是绿莹莹的光,面对着这绿灯,我停止彷徨,跨越十字路口。”但诗歌最后却呈现出柳暗花明的结果:“烟火外,我耐心等待/北上的公路/张开腿,亮着绿灯/让我像堤岸崩溃后的洪水/闯入桃花夹岸的古津尽头/是喧闹的庙宇”。但整首诗毋宁更呈现出情绪的复杂性,意义相对含混。

需要指出的是,王润华并非是单一的个案,他同时也是集体——“星座诗社”的代表之一。“星座诗社”,这个由马来西亚侨生为主体的诗歌社团,开启了马华青年在台湾组织文学社团的先河。其大马籍的核心成员主要是林绿、淡莹、王润华、陌上桑、陈慧桦、麦留芳、叶曼沙等等。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既获益于台湾现代诗崛起的潮流挟裹,同时又是建设者和参与者。尽管台湾对他们的影响居多,但作为参与者,他们其实对台湾文坛的丰富和活力也不无贡献。这种幽微的内在互动才更呈现出文学发展的复杂性和迷人魅力。

(二) 返观台湾

耐人寻味的是,王润华离开台湾后赴美攻读研究学位,学成后到新加坡执教,一直到2002年。而2002—2012年他又颇有缘分地在台湾元智大学担任教授十年,这让他可以更好地返观台湾——他对台湾的认知和感情都会更加深厚,毫不奇怪,他对台湾呈现出很复杂而微妙的情感:一方面,他是台湾外聘的国际专家,而且台湾也是他身份转换的重要场域,从当年的侨生变成了侨居的外国人才,为此,他对台湾的诸多优点不吝赞扬;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对台湾感情真挚、深厚,而且由于台湾难得地拥有华人世界特别宽松的言论自由度,为此,王润华对台湾的不足也敢于提出建设性意见。

1. 褒扬台湾。台湾的人情味素来有名,但台南的去中国化意识和台独倾向也很强烈,二者可以并行不悖吗?《重回台南的异乡人》则是书写他亲身的经历,以国语问路的“我”遇到只会闽南话的他,结果是离开很久的他又回来亲自指路,这当然不是个案,为此作者不禁感叹:“我突然领悟,本土文化意识为台南制造很多文学家,为台南生产很多善良、负责的普通老百姓。”人情味和效率当然也有来自政府机关的改良,《重回台湾政府机关办事》则说明台湾有关部门服务的提升,非常人性化、客气、高效等。而在《台湾文学的多元性》里作者也部分表扬了台湾文学对各色文学的涵容,有其世界性和开放性一面,但作者也提醒台湾要提防“政治的本土主义单面向的性格”。

台湾也有很美丽的自然风景,《重回台湾解严后风景区》提及很多风景因为解严后从军队或官方征用还给广大民众,令人惊喜不断,比如基隆的和平岛海滩、金门、龟屿“蓝色鲸喜”之旅、三峡大板根公园、莺歌陶窑老街等等。《重回野柳》就是对本土化之后的野柳自然风貌和附近的朱铭美术馆人文风景双峰并置的赞美。除此以外,一直提倡大学无藩篱的王润华似乎也在其母校政治大学身上找到确认,《重回没有围墙的大学》其实是回忆自己求学时候政治大学的知识整合与开放性。

2. 建议与批评。更令人感兴趣的或许是王润华对台湾的谏言。集中的几个问题如下:(1) 简体字问题。王润华就台湾的简体字问题写了几篇文章,如《回返查禁简体字书的日子》《重回简体字的禁忌》《重回正体字的困境》《重回简体正体字的对立问题》等,可见他对此问题颇有意见。总结王润华的建议,其实主要就是强调简体字之于台湾的重要性:“因为简体字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语文”,“不能阅读简体字平面与数位化资料,也同样会失去许多中华文化”;另外,他也淡化简体字、正体字所谓的“对立”问题,二者同样重要,但全球的一般民众考量则来自现实层面。毋庸讳言,汉

字简化是个很复杂的问题^①,王润华提出的问题其实对台湾相当重要,简体字出版物的日益繁盛,使用者已经占据绝大多数华语人口,学会认读简体字的确是一个必需,至少大学文科学生应该可以实现。(2)多元化/国际化问题。虽然台湾是一个国际化的区域,但在王润华看来,有些层面明显做得不够。《重读台湾新闻媒体》则批评台湾媒体较少关注台湾以外的世界进展,这自然也是本土化的限制之一。作者指出,“台湾拥有最大的自由与文化空间,但很多文化人像我一样,仍然期待台湾会出现有文化广度与深度的新闻媒体的出现。”相应的,他也注意到台湾大学的某些问题,《重回台湾多元文化的校园》则一方面批评台湾的校园国际化和多元化程度不够,甚至比50年前要差,另一方面,指出台湾学子出国留学的人数变少,这都是值得注意的倾向。

模式二:立足台湾想象南洋

第二种模式的核心问题其实指向了一个话题,那就是怎样原乡?我们不妨以李永平、张贵兴为中心加以探勘,李、张共性更多,他们出身东马,都入籍台湾,都擅于书写台湾与东马的对话,然而他们又有不同的线路。

(一)李永平个案

身心的位移让李永平、张贵兴的原乡书写呈现出相对独特的轨迹和特点,比如李永平在台砂并置^②主题上的“在地——离去——归来”圆形本土曲线的意义营构和文类追求,如张锦忠所论,他的“文化原乡,从围城的母亲出发,经过《吉陵春秋》(神话)的文字修炼与《海东青》(寓言)大规模的文字围城实验,显示出自我与原乡透过文字(中华文字不仅是李永平所说的‘中国语文的高洁传统’,也是华人的精神与民族灵魂象征)及不同文体的操练建构他的主体性(历经神话——寓言——忏悔录的文类之旅),进行一场‘自我与灵魂的对话’。到了《雨雪霏霏》(忏悔录),作者正视他的原乡欲望,终于回到故乡去寻找自我认同,回到他(父-母-我)的‘伊底帕思’情境,流动的身体与灵魂对话的意旨就更明显了。”^[8]

截至目前为止,李永平的台砂并置其实是以婆罗洲开始,之后又以婆罗洲暂时告一段落并收尾的。当然,毋庸讳言,台湾体验和元素从未缺席。大致而言,李的台砂并置书写可分为三个阶段:

1. 返观与提纯:从《拉子妇》(1976)到《吉陵春秋》(1986)。作为留台生的李永平,其步入文学殿堂和台湾息息相关,先是得到王文兴教授的启蒙与激励,催生了《拉子妇》,后有颜元叔教授的马上一鞭,帮助醍醐灌顶。如果从此时期文学创作的质量来看,李永平拥有不错的起点。短篇《拉子妇》其实一开始就具有震撼人心的自省性,当然也不乏强烈的“孺慕”抒情;但若从华巫族群对立的角度思考,李无疑具有超越华族文化限制的人性关怀。留美时期的李永平在转换位置后似乎有了更深邃辽远的追求。如果说《拉子妇》初步彰显出其书写功力、潜力和不落俗套的话,那么后起的《吉陵春秋》则让人对南洋浪子刮目相看。

2. 台湾存在:从寓言到状摹。毫无疑问,作为李永平生活时间最长的台湾之于他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而彼时富丽繁华的台北对于刚从婆罗洲来的浪子冲击颇大,甚至令他记忆犹新。从目前来看,《海东青——台北的一则寓言》(1992)是李永平台湾性最强的小说文本,其中对台湾的状摹可谓苦心孤诣,从地理历史连缀到现实繁华勾勒,从各色欲望铺张到世代更替中成长和发展的诸多

① 有些相对专业的讨论可参史定国主编《简化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② 这里的“台砂并置”指的是书写者有意识将台湾与砂拉越安放在小说书写的内容中,最集中的做法是形成一种明显的对话关系,无论是小说内容,还是读者解读;其次,也可以是一种人物关系之间的缠绕,而不可捉摸却又不容忽略的还有作者在处理一个关键向度时呈现出对另一个向度的潜在凝视。

问题,从阴魂不散的日本意象到意兴阑珊的蒋公理念,从象牙塔无聊扯淡到政治民主开放初期的混乱,近乎无所不包,但这部作者辞职专职写作而投注大量心血的皇皇巨著并未如期待那样成功。被视为《海东青》下部的《朱鹁漫游仙境》(1998)深得作者喜爱。和《海东青》的过于庞杂和宏大不同,其脉络相对清晰可辨,朱鹁视角的被借用让作者对欲望台北的书写更有看头,虽然可以考察的场景和主题减少了。从此意义上说,靳五和朱鹁成为以脚丈量、以眼拼贴台北的重要凭借。

3. 从对视到回乡。从台砂并置的脉络来看,《雨雪霏霏:婆罗洲童年记事》(2002)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文本。承上,是它以相当精彩的手法结构故事,以台北某国小二年级姑娘朱鹁作为实际或潜在的对话者继续书写,题材方面涵容台砂,往往从微观个体入手,不再过于凸显磅礴气势,但读者却首先是台湾人,以台湾的方式返观婆罗洲。《雨雪霏霏》下启的是李永平婆罗洲书写的强势回归,其代表作就是巨著《大河尽头》(2008—2010)。在这部长篇中,一贯书写“旅行本土”的李永平更加重了台湾元素的砝码,而显示出其可能落地生根的倾向。^[9]

(二) 张贵兴个案

张贵兴的台砂并置书写路径与李永平不同,李的高潮是在中部或创作中期,张贵兴似乎更强调两头,尤其是相对后期(2000年前后)的文本。而实际上,张贵兴的文学书写、情节架构、主题叠加等等都经历了一个演变,即从清新到相对重口的转换,对本土的发现有一个开放的线性前进过程,一度绽放,但同时却又不乏破绽。如金进所论,张贵兴“从留台生文学的青涩模仿,到不同经验的书写实践,再到自成一脉的雨林书写,他用自己的笔墨展现出自己创作生涯中的不同的艺术实践过程,后期的南洋雨林魔幻世界的书写,集合象征、寓言和历史再现于一体,展现出一位旅台马华作家对原乡书写的不懈追求”。^[10]毫无疑问,他们都是此类书写的集大成者。

从台湾经验角度重读张贵兴的马华与南洋书写,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诸多主要议题书写的洞见或盲点,无论是对于马共/砂共题材的情欲化、夸大化处理,还是对相关文化中国性的清算,还是对雨林和土著事务的状摹。同样,不同的台湾经验分层也影响到了张贵兴对南洋的更深邃理解,从而也让我们看到了张贵兴文化身份的游移、尴尬和可能的悖论性。^[11]

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李永平、张贵兴亦有其迷思,在我看来,一方面他们要“再历史化”,无论是持续台湾化还是要再婆罗洲化,借此丰富自我认知、开拓书写资源,而另一方面,他们也要选择合适的叙事技艺,将台砂并置书写提升至一个新境界。

模式三:回归大马的南洋创制

第三种模式则呈现出台湾留学后可能继续放逐,但往往最终落脚大马,代表性的作家则是潘雨桐。我们可以反问的是,台湾经验之于留学后成为马华文坛的归返者——潘雨桐到底意味着什么?在小说中有怎样的层次和轨迹?而在小说实践中,台湾元素和南洋叙述有何关联?长期生活、工作于大马的潘雨桐对东马的书写又有何独特性和穿透力?

更进一步,潘雨桐是跨专业、跨领域书写,他学习园艺,在热带雨林工作,却能坚持不懈创作。虽然是西马人,却也长期在东马工作,因此和前面所述李永平、张贵兴的雨林书写有复杂的对话关系。潘雨桐的书写自有其脉络:从早期的颇有言情小说的流行风格,到中国风的浓郁呈现,再到本土议题的实验性杂耍,包括后现代手法的使用,然后再到介乎写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雨林/东马再现。潘雨桐的小说技艺虽然并不特别具有创造性,但亦有自己的风格,立足于坚实实践基础之上的清新再现,不做作,不夸张,不寒碜,一如荷花香远益清;同时他在两极分化的砂拉越书写中亦有自己的位置,不同于李永平、张贵兴的特色鲜明,也不同于东马本土书写的相对朴素与枯燥。

简单说来,台湾经验之于潘雨桐自然有其重要性,某种意义上说,它既是其世界华人背景的底

色,又是中国性的文化落脚点之一,同时又反衬出南洋叙述层次的呈现。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潘雨桐几乎经历过大马立国前后所有的重大事件:英殖民、日军南侵、马共、大马立国、“五一三事件”等等,同时他又曾留学未解严时的台湾、强大而富有活力的美国,这种经历毫无疑问会让他无论是对个体还是大马华人的身份认同都有着更丰富的感受、焦虑和反思,而实际上反映到其作品中,这的确也是其感同身受的关键词。

毋庸讳言,南洋书写是潘雨桐念兹在兹的核心题材,而台湾经验似乎亦是一种时隐时现的衬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潘雨桐回归大马,终究南洋还是不折不扣的重心。潘雨桐的南洋叙述中,身份焦虑一直如影相随,或通过与他者的遭遇加以比照,或通过归归来加以确认,都值得反思。而在别具一格的东马再现中,潘雨桐借助现实、自然、传说和神话的浑融呈现出一个相对震撼的雨林/大河叙事图景,同时他也对后殖民本土进行了深入反省。^[12]

史书美指出,“离散会有结束的一天。一旦移民(包括移进和移出的人)定居并变得本地化,第二或第三代都会选择结束离散的状态……因此,强调离散会有终结的一天便是坚持认为文化和政治实践始终是以在地为主(place-based)。每个人都应该有成为当地人的机会。”^[13]某种意义上说,潘雨桐以多重身份(博士、园丘经理和作家)归返大马似乎是一种示范,在他的创作中,潘雨桐有一种更加坚定而浓烈的本土书写倾向与风格。从书写自然来看,雨林成为其书写的关键词之一,丰饶的各类资源,疯狂的各色开发,经济挖掘与自然保护之间就这样张力十足,但潘雨桐处置得相对淡定而坦然,言辞间更呈现出一种深切的本土关怀,亦采取了貌似平淡实则浓郁的情感扬抑法。

特别引人关注的则是潘的东马叙事。身为园丘经理的潘雨桐,对于东马、雨林、大河等等有着一般作家难以掌握的丰富又独特的人生阅历和复杂纠葛:他的公司开发森林、烧芭、垦殖等等,不可避免地破坏生态环境,而他却是对雨林、大河、东马有着深切感情的本地人。而落实到文本上,也就是他以精彩纷呈的《河岸传说》为中心,他对雨林的思考和一般人的确不同,他在“后记”中写道,“如是场景置换可以随心所欲。而我,攀越板根耸突的山路,或是涉水走过阴暗的溪谷,仰望长天,总是给大树的华冠相互遮掩。偶有阳光投入,犹是天机泄漏。在人与热带雨林之间,竟是如此的不相容——热带雨林每年正以二千万公顷的速度消失。”相较而言,潘雨桐的雨林书写比不上张贵兴的夸张繁复^[14],但也因此更清新而具有可信度;和李永平的《大河尽头》比较,潘雨桐显得朴素、拘谨,但也因此似乎更言之凿凿而又娓娓道来。

模式四:台湾视野与南洋论述

第四种模式则可以呈现出马华批评的台湾视野及其丰厚力度。某种意义上说,马华批评家“六字辈”的世代代表作家则纷纷登场,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往往都是左手为文,右手批评,比如黄锦树、陈大为、钟怡雯等都是一时的好手。黄锦树不仅仅是长于中短篇小说,同样还有出色的文学批评技艺,而两者对照阅读,反倒可以看出他的洞见和可能偏执;长于诗歌的陈大为、擅长散文的钟怡雯同样也是学者型作家,他们的苦心孤诣也有让人探究的动力;曾经留学台湾后最终定居香港的马华作家林幸谦,一方面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和马华文学研究专家,同时又是诗人和散文家,他的心路值得仔细探研。

我们不妨以批评成就最高的黄锦树为例加以研究,考察台湾体验与“黄锦树现象”的复杂关系,不难发现,台湾经验是旅台学者黄锦树立足台湾的资源支撑与“反攻”大马的利器,而同时黄锦树的反戈一击对于台湾又是一种伤害和背叛。对马华本土的大力批判毋宁更反映出黄对大马这块阵地的高度重视和迷恋。无论黄承不承认,就读于台湾“惨绿”中文系的复杂体验至少让努力且聪颖的黄锦树有一种返观马华的资本,在台湾所受的学习压抑与对马华本土陈旧传统与马来特权

(及其政策)的夹击让黄锦树必须找到宣泄口:一方面黄锦树借助小说创作戏弄、调侃冷嘲热讽马华本土;另一方面,他又以凌厉的文学批评攻势放火“烧芭”,质疑马华文学的种种,比如称谓命名、破中文等等,或者是挾伐“经典缺席”、倡导断奶论等等,似乎每一个议题都是热点。他不仅仅是质疑马华“老现”,而且也示范如何现代:在他相对精彩的论文《境外中文,另类租借,现代性》中,虽然论题略显驳杂松散,但他的观点颇有可观之处。比如坚持流动的建构的文学史观,而且以多位作家为例反对并更正本质主义者的起源说。在论述郁达夫个案时,他总结道,“郁达夫流亡与失踪的个案质疑了起源的线性时间观(前-后),更让马华文学史的起源处于流动的状态,使其暧昧不明——伸向地理上的外在,跨出民族国家与民族史学的界线,指向一种无限——失踪(无法入土为安、无以辨识、失去方位)——现代性暴力所造成的无限的感伤行旅”,^[15]颇有强大的解构精神。

而对台湾的背叛既是一种对伤害的回应,又是一种丰富。同样需要注意的是,黄锦树对中国性和本土性都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吊诡情结,其中也有需要清理的霸权逻辑,甚至也部分限制了他的自我提升。一方面,他对中国性(Chineseness)大加挾伐,无论是他对马华现实主义的挾伐与清算,还是对中国性深度阙如的不满与痛批,骨子里都是对政治化的中国大陆的拒斥,因为“本土老现”们的理论传承就是中国大陆;对国学的强调又是对当年新文化运动贬斥传统与古典的潜意识反拨,在此基础上,黄锦树才可能凸显马华文学的主体性,而尤其强调他们台湾影响下的旅台文学核心,乃至新文学的起源地位。另一方面,他对本土充满质疑和批评,其实更是担心自己被双重边缘化(double-marginalized),因为无论是马华本土,还是台湾本土他都不具备充分和长久的合法性。往往是从此种潜意识出发,他痛恨大马华文文学的本土性说法,而把它变成与己命运和身份类似的永远的离散文学(颇具刻板印象风格)。^[16]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较少涉及新加坡留台作家,这固然是因为论文的侧重点不同,但也有其他原因:相较而言,由于新华文学已经被列入国家文学行列,不像马华文学依旧苦苦挣扎,摆脱不了妾身未明的族群文学身份,反倒多出强悍的信念追求和文化身份借助,留学台湾的作家、学者必然呈现出深刻的台湾痕迹,而新华作家则相对较少,貌似被“收编”、实则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相对明晰的他们往往更喜欢在新加坡时空内发声,比如柯思仁、蔡深江等等,他们逆袭台湾的冲动和实践相对不强。如游俊豪博士也在研究中指出,“更有历史意思的是,新华场域跟1978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场域建构文学的双向复系统……台湾,从来没有成为新华作家的基地。”^[17]

结 语

毋庸讳言,就上述议题的研究主体而言,在台马华批评家自然有其天然优势:在批评完陈大为的《最年轻的麒麟》之后,黄锦树曾这样评点谁最适合撰写在台马华作家文学史的论述:“老的如李有成(我在不同的场合均批评他对马华文学做得实在太少)、张锦忠(其《马来西亚华语语系文学》虽非专论在台马华文学,但涉及的部分也比大为这本可靠多了)。年轻的如高嘉谦,或仍在写博论的如詹闵旭、刘淑贞、陈允元等。而我判断,由年轻一代来写会更好,因为他们学术刚起步,必然全力以赴。”^[18]所论有一定道理,毕竟在台或留台经历具有历史现场感,相较于大马当地的批评和论述而言,占有太多优势,甚至包括理论、出版层面,都足以傲视大马的书写者。

但在台马华学者书写自我的创作和论述同样也有弊端:迄今为止,由于可能被“双重边缘化”的危险,一方面,要在台湾扎稳脚跟,另一方面,却又远离大马本土创作和权/利的中心,他们都没有摆脱“自我经典化”的缺憾——画地为牢、自我表扬并且极度蔑视不同立场的论述,这就意味着他们其实很难摆脱小圈子主义并真正扬长避短。从此角度来说,如果论者既知悉台湾文学场域,又熟谙马华文学,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生发出可能更客观的有关论述,而本文则不过是一种初步的尝试

和论纲,所谓四种模式更多是从宏观层面的梳理,更繁复的逻辑交叉、更深层的个案叙述和更具体的理路逻辑梳理仍可继续深化和完善。

注释:

- [1]托·斯·艾略特:《批评批评家》,李赋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1-22页。
- [2][18]黄锦树:《这只斑马陈大为〈最年轻的麒麟——马华文学在台湾(1963~2012)〉》,《华文文学》2013年第5期。
- [3]朱崇科:《论欧大旭作品中的“大马”认同确认及吊诡》,《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第4期。
- [4]高嘉谦:《马华小说与台湾文学》,《文艺争鸣》2012年第6期。
- [5]朱崇科:《方北方的文学本土转型及其限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 [6]赵秀敏:《行走中的坚守——访南洋著名作家、学者王润华教授》,《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
- [7]陈义芝:《声纳——台湾现代主义诗学流变》,台北:九歌出版社,2006年。
- [8]张锦忠:《(离散)在台马华文学与原乡想象》,台湾《中山人文学报》2006年第22期。
- [9]朱崇科:《(后)殖民/解殖民的原乡(朝圣):〈大河尽头〉论》,《南洋问题研究》2014年第1期。
- [10]参见金进:《从出走台湾到回归雨林的婆罗洲之子》,《华文文学》2009年第6期。
- [11]朱崇科:《台湾经验与张贵兴的南洋再现》,《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 [12]朱崇科:《后殖民时代的身份焦虑与本土形构——台湾经验与潘雨桐的南洋叙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
- [13]史书美:《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杨华庆译、蔡建鑫校,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3年,第268页。
- [14]朱崇科:《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学与本土性》,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248-278页。
- [15]黄锦树:《文与魂与体》,台北:麦田出版,2006年,第104页。
- [16]朱崇科:《台湾体验与黄锦树“南洋”论述的吊诡》,《暨南学报》2014年第6期。
- [17]游俊豪:《移民轨迹和离散论述:新马华人族群的重层脉络》,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第190页。

[责任编辑:廖哲平]

Representative Modes of Taiwan Experiences in Malaysia's "Nanyang" Narration

ZHU Chong-ke

(School of Asia-pacific Studi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Abstract: The issu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Experiences and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field is a preceding topic within Sinophone literature studies. How do we evaluate Taiwan experiences i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It is an interesting but complex issue and also a large challenge both to the authors and to the researchers. This kind of impacts and representa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modes: 1. general vision and its genealogy based on a case study about WONG Woonwah; 2. Nanyang writing based on Taiwan, with an emphasis on how the Malaysian writers in Taiwan describe their hometown-Malaysia; 3. Nanyang writing based on Malaysia, with an emphasis on how they deal with Malaysia after they returned to Malaysia from Taiwan; 4. Nanyang criticism in the framework of Taiwan vision on which the Malaysian critics in Taiwan of course have a good advantage. The above four modes are dealt with from a macroscopic point of view and more concrete case studies must be develope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Nanyang narration, Taiwan impacts, WONG Yoonwah, ZHANG Guixing, PAN Yutong, NG Kim Chew